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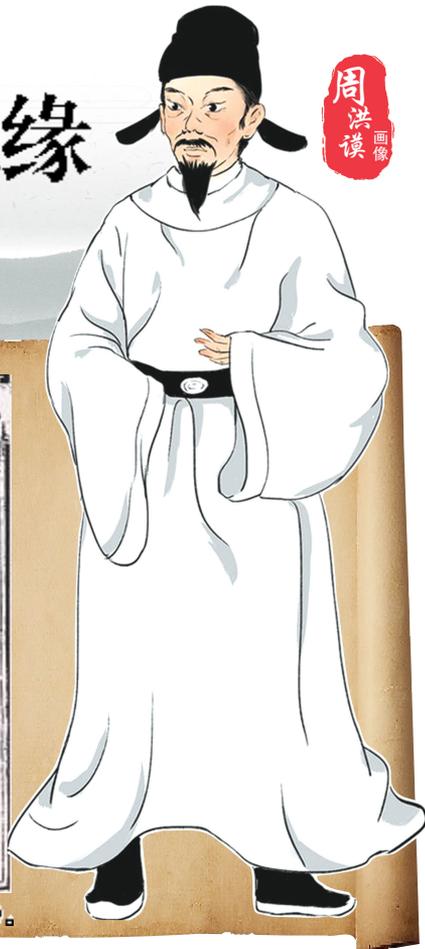
说起周洪谟，《明史·列传第七十二》有载：“周洪谟，字尧弼，长宁人。正统十年，进士及第。授编修。博闻强记，善文词，熟国朝典故，喜谈经济……将歿，犹上安中国、定四裔十事。”全传记共603字，详细介绍了周洪谟的生平经历和40余年的仕宦生涯。

经查史料，周洪谟是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叙州府长宁县（今宜宾市长宁县）人，生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卒于明弘治四年（1491年），去世后获赐谥号“文安”。他从小勤奋好学，25岁参加乡试名列第一，次年参加会试，以一甲前三名的成绩，被皇帝钦点为榜眼（第二名），接着被授予翰林院编修，经历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五朝，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（相当于今学校校长）、礼部尚书等职并加封太子少保，是享誉明代的重臣名宦。此外，周洪谟博学多才，“举凡六经诸史、古今诗文，以至医卜老释之说，无不深究”，素有“明代通儒”之称。

殊不知，就是这么一位学识渊博、身居显位的人，竟然与富顺县还有多次相近之缘。

明代名宦鸿儒周洪谟与富顺之缘

□刘刚



周洪谟画像

明伦堂碑记
成化周洪谟
向书周洪谟
道不外乎五伦而已，尧舜禹汤文武以之，师天下孔子以之，师万世师天下者，必盡人伦之至，以建极于上，而上而又设学校庠序之教，以明伦教于下，师万世者，不得师天下之任，而推明至圣之道，以建极于上，世使师天下者，必法之以建极明伦也，至朝列圣相承，既建极以作式，又设学以明伦，盖自京畿以达之於率微，所在郡县，莫不置学，四川郡县，学百有三十，餘，而人才之多，风化之盛，未有過於富顺者也。予

富顺县志卷之二十三
志是以知之，迨至国朝，士之登甲第以出身，为尚书任侍郎列朝，署官藩郡者，咸有其人。是雖本於大化陶治之功，要亦有司勸相之力，在成化尹李君朝用，嘗葺廟學，令尹梁君光輔以名進士繼之，畢其所未畢，功舊靈星門以石易木，舊爵蓋以銅易錫，展學地若干丈，費若干百，立育才坊，立桂坊，造石香爐，凡既備矣，乃來求記於予，予惟學制講道有堂，肄業有齋，會膳有房，習射有圃，堂之前建大成殿，及大成門，及左右兩廡，塑先聖、四配、十哲及門弟子歷代名儒像，凡百又二十五，春秋必祀，朔望必謁，後進之遊乎此者，晨夕密迹，官牆之下，恍然如親炙於杏壇之上，豈可聚談曠日而已哉！必尊師親友，即經以明道而踐之，以信其朋友。他日，見試于國，以之忠君，以之庇民，以之修政事，以之樹聲績。則于斯學，豈不為有光乎？于戲！道若大路，然豈難知哉！講之明，踐之力，道在斯矣。故因斯學之新而推本國家道化之意，以為諸進士

清乾隆二十五年《富順縣志·藝文》載周洪谟《明倫堂碑記》。

壹

与富顺风物人文之缘

在明代，周洪谟的家乡长宁县与富顺县同属叙州府管辖，两地一南一北相距百余里，是名副其实的邻近之县。正因这样，两县人员往来密切，相互研学观光早成常态之势，而周洪谟到访富顺确有县志可查。

清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年），叙州知府何源濬为《富顺县志》作序时称“富邑辖于叙（州），较他邑称为胜地”。后来，著名知县段玉裁在续修《富顺县志》时，也称“县带洛而衿江，山气佳秀，典午（代指晋朝）以后才俊蔚起，文物称最盛”。可见，富顺的风物在川南确实值得称道。

其实，早在明正统年间，陕西咸宁籍富顺知县李真在创修明代首部《富顺县志》时，就曾亲自题咏“富顺十景诗”，即《古井咸泉》《泮宫丹桂》《北岩石洞》《东津舟梁》《劝农仙境》《瀾崖渔歌》《万寿晓钟》《凌云夕照》《南浦晴岚》《西湖夜月》。这10首诗相当于写了10个景区，也从侧面证明了正统年间的富顺同样“较他邑称为胜地”。不可否认的是，“十景诗”的发布为富顺带来了更大的光环效应，引得无数文人雅士、墨客骚人纷至沓来，随即又催生出《青山锁峡》《釜水环江》《月崖甘泉》《翠屏天榜》《马脑乾关》等新的“江阳十景诗”。

其中，《青山锁峡》所咏之青山位于富顺县南部，与长宁县相距更近。青山为富顺四大名山之一，因其林木深秀、天际浮青、四时一色而闻名。更绝的是，山之中段有一个“俨若瞿塘”的峡口，两岸高峰耸立，对峙如门，仰天一线，故有“青山锁峡”之盛景。在青山峡附近，先后建有大定寺

和金田寺两大名寺。据富顺旧志记载，大定寺最早修建于元泰定年间（1324年-1328年），明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又由一名为如善的和尚进行重修。金田寺则更加充满神奇色彩，传说明代建文帝曾云游至此，分别有程济和《建文金田寺诗》与刘莅《建文从游十一先生记》为证。后来成化年间（1465年-1487年），金田寺得到重修，并新塑建文帝像。尚书周洪谟曾为大定寺作记，也曾曾在金田寺留有八景诗并序，可惜这些宝贵的诗文并未流传下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周洪谟不仅曾到富顺游历，还曾为富顺留下过游记类文字。

通过进一步细查富顺旧志，发现周洪谟尚有《明伦堂碑记》（又名《重修明伦堂记》）一文得以刊存保留。一直以来，明伦堂是富顺文庙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专供读书、讲学、论道之用，历代富顺主官都重视其修缮管理。明成化年间，先后有山东籍知县李嵩（字朝用）、江西籍知县梁文（字光辅）对文庙及明伦堂进行整修。特别是梁知县，“修明伦堂，展学地十丈，造石香炉等”，专门拜请尚书周洪谟为其作记。向来尊孔崇儒并视教育“有神风教”且“以正人心”的周洪谟欣然应允。他在《明伦堂碑记》中交代了写作此文背景：“往岁，县尹李君朝用尝葺庙学，令尹梁君光辅以名进士继之，毕其所未毕。旧榑星门以石易木，旧爵盖以铜易锡，展学地若干丈，资费若干百，立育才坊，立丛桂坊，造石香炉，凡既备矣，乃来求记于予。”

周洪谟在文中特别指出：“道，不外乎五伦而已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

以之师天下，孔子以之师万世。师天下者，必盡人伦之至，以建极于上，而又设学、校、庠、序之教，以明伦于下。师万世者，虽不得师天下之任，而推明群圣之道。笔之经以诏万世，使师天下者必法之，以建极明伦也。”周洪谟阐述了以“道”师天下、师万世的重要性，这既是以道德立国的明王朝所要求，也为明代富顺办学提出了方向。

他进一步强调：“予惟学制，讲道有堂，肄业有斋，会膳有房，习射有圃，堂之前建大成殿，及大成门，及左右两廡，塑先圣、四配、十哲及门弟子、历代名儒像，凡百有二十五。春秋必祀，朔望必謁，后进之游乎此者，晨夕密迹，官牆之下，恍然如亲炙于杏坛之上，岂可聚谈曠日而已哉！必尊师亲友，即经以明道而践之，以孝其亲，以敬其长，以睦其宗族，以信其朋友。他日，见试于国，以之忠君，以之庇民，以之修政事，以之树声绩。则于斯学，岂不為有光乎？于戏！道若大路，然豈難知哉！講之明，踐之力，道在斯矣。故因斯學之新而推本國家道化之意，以為諸進士

《明伦堂碑记》一文，周洪谟站在礼部尚书的视角，结合学校教育对以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为核心的“五伦”关系进行深刻论述，体现了其“以道学治天下”的理学思想和“学校之制，明人伦，革人俗，成人材”的办学方向，无疑对“才子之乡”富顺的县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同时，周洪谟为文庙明伦堂作记，也是朝廷高官关心关注富顺教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
貳

与富顺才子之缘

自古以来，富顺县盐业经济发达，引领文风日趋鼎盛。特别是北宋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修建文庙以来，涌现出一大批才子。其中，仅宋代就产生进士67人，至明成化年间进士又累计增加至近百人，出现“景泰十才子”之一的晏铎等人才，为富顺县赢得“才子甲西蜀”“富顺多才子”“才子之乡”等美誉。

相比之下，同为产盐大县的长宁县的进士却甚为稀少，这让同时代的周洪谟羡慕不已，于是他在为富顺所撰的《明伦堂碑记》一文中感叹道：“四川郡县学百有三十余处，而人才之多，风化之盛，未有过于富顺者也。予尝参稽宋《輿地纪胜》《寰宇记》，元《大统志》诸书以修郡志，是以知之。迨至国朝，士之登甲第以出身，为尚书、任侍郎列朝，署官藩郡者，咸有其人。”

周洪谟所谓“士之登甲第以出身，为尚书、任侍郎列朝，署官藩郡者”，就包括正统戊午解元、壬戌进士、刑部侍郎黄仕儒[jùn]和正统戊辰进士、礼部尚书李本等31名县进士，他们都是500多年前的富顺人杰。这些富顺籍进士，与周洪谟先后因缘际会于明代官场，甚至同朝为官。笔者以为，同为叙州同乡，相遇他乡没有不相识相交的道理。这其中，黄仕儒比周洪谟早3年“登甲第”，李本比周洪谟迟3年入朝堂。巧合的是，黄仕儒与周洪谟都是乡试解元（第一名），李本与周洪谟都担任过选翰林院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、礼部尚书等职，有同郡老乡之谊。

文图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